

我的記憶是白

中秋前夕，舅舅提著一盒月餅，出現在我面前，他的背後，跟來一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。

我起身致意，推辭不收下那盒月餅。我們站在台南鬧區的飯店大廳前，落地窗流動著恍恍惚惚的人影。舅舅轉身介紹後頭的老婦人，白髮整齊梳理，像一頭瀑布地向我點點頭，說她姓顏，舅舅遲疑地加上一句：「我們，有六十幾年沒見面了。」

我邀請他們進到飯店吃自助餐，老婦人跟著舅舅拿個盤子取生菜沙拉，閃亮的湯匙和叉子躺在右手邊，吃得不多，也不多話，不時迎向舅舅探問的眼神。「你一點都沒變。」她放下叉子，意味深長地說著。「沒有，我老很多了，體力也變差了，許多人的名字，我也想不起來了。」舅舅回答。

年輕的舅舅確實壯得像一棵樹，那是我滿周歲的事，媽媽抱著我，和十六歲頂著光頭的舅舅在文旦樹下合影。我轉而想從老婦人蒼蒼白髮間，想像她十六歲時的模樣。

趁著老婦人起身取菜，我問舅舅：「你們怎麼又見面了？」

舅舅放低聲音，說：「是我去找她的，我就覺得，我這輩子還要再見到她一面。」

我知道舅舅幾個月前診斷出攝護腺癌，已經無法動手術，那時正要展開化療。或許覺得時間不多，舅舅列出一張清單，要利用餘生完成的心願，其中，也包括和她的見面。「她是你的初戀情人嗎？」我望著增添了皺紋也消瘦許多的舅舅問道，舅舅黯然沉默，像我記憶中的一塊岩鹽。

在我記憶裡，家在佳里的舅舅就是標準的鹽分地帶的男人，鹽田裡過度曝曬的男人，溫情卻拘謹著，不輕易地說出心事。

舅舅和老同學回憶著往事，許多往日同學的名字再度提起，就像喚醒的老靈魂，在台南午後的餐廳裡徘徊，我安靜地撕著盤裡的燻鮭魚，此刻不是我可以輕

易驚擾的。只聽那老婦人說了一句：「你還記得那天在糖廠的事嗎？」舅舅猶豫的點頭，眼角泛著淚光，怎麼能夠忘記呢？我聽見舅舅小聲地訴說。

我忽然覺得，在地理上，台南確實是這場相會最好的地點，歷史裡的台南，始終就是鹽和糖的輸出和生產的交匯，多年前，北方的鹽和南方的糖都選擇從這裡運出海，成為家人團圓宴裡的佐料，或是遠方一杯紅茶裡的調味。如果舅舅是一把鹽，我眼前的老婦人，曾經有過的風華，就是蜜甜的糖。

有些記憶屬於我一個人，在台南家鄉，沿著海岸邊鄭成功軍隊行過的路線，向七股方向，四百年前他們向平埔族搶地，殺害原住民開闢鹽田，鹽的故事就是血的故事。海風吹降一片片潔白的鹽田。沿路的魚塭翻騰銀白色的鱗片，日照強烈，我總把自己想像成鄭成功初見海岸的情景。然後路線轉向南，南方的想像，欄杆放下來，叮叮噹噹的聲響，小鐵路定期有載滿甘蔗的小火車從我們眼前越過，好像，那是我小時候的禮物啊。那時，甘蔗是生活的奢侈品，總要隔許久，爸爸才會帶一根黑黑的甘蔗回來給小孩啃，一面啃著一面吸甘蔗甜甜汁液。

小火車來了，小孩跟在鐵軌後面撿掉落的甘蔗，幾個塊頭大的孩子乾脆搶別的小孩撿的甘蔗，但怎麼能依他，我就這樣在鐵軌邊結結實實打了好幾架。回家，捧著我的戰利品，顧不得嘴巴流血也要先啃一截甘蔗，黃黃甜甜的汁裡揉著我的血。

眼線再向南方延伸，那是當時的年紀還沒有到過的國度，吹拂甜甜的風，想像小火車一路向南，穿越茂密的甘蔗田。嚇，那時的大人說，甘蔗田完全遮蔽陽光的時候，夜晚，你想像不到的怪獸從地底現身啃吃甘蔗，到了白天，農夫再將倖存的甘蔗種回土裡，甘蔗田發出一聲長嘆。再向南，我只在地圖上走過的，想像港口、大海，想像屏東活在勁風裡的西瓜。

有些，屬於我們家族共同的記憶，舅舅、媽媽帶著外祖母的一場旅行，那是外祖母生前最後一次出遊，或者知道要告別了，外祖母那天眼色略帶憂愁，但她是鹽分地帶的女兒，一輩子不曾離開她的家鄉，像一把融化在口中的鹽，怎麼

可以輕易流露哀愁。我還記得外祖母家的庭前曝曬著鹽，陽光的完美演出，家裡吃的鹽，都來自這對夫妻的手溫。

那天，我們的隊伍走過佳里、學甲和七股，感覺外祖母在向她們認識的一切道別，她用蒼老而依依的聲調，吩咐舅舅「你得開慢一點」，好像她真正的意思是，讓我多看一眼吧。

來到鹽田和魚塭包圍的餐廳，她似乎認識鹽分地帶的每個人，「阿嬤來了，快帶他們上樓。」我彷彿聽見這般耳語。生意極好，但外祖母似乎有個專屬的座位，我記憶中和外祖母最後一場用餐，則以白獻祭。外祖母的白髮向後挽成一個如意結，白色的鹽封裹著燜熟的虱目魚，得用木槌敲開已經死去的鹽，像剖開一個繭那樣的取出虱目魚，我覺得餐桌上的吃食，就是一場誕生，溫熱而鹹的香氣，是鹽的生命的色澤。

那年我剛滿三十歲，從此每陪媽媽回娘家，都作興要去吃鹽焗虱目魚，也許是懷念陪伴外祖母的日子，也許是追想我已經失去的某些什麼。鹽和海的情懷，廣場上趴成一條條行列的鹽，鋪在大地的波折號，要跟我說些什麼呢？我是鹽，我帶來生命，我帶來文明。

眼前，舅舅和他的老同學沉默地吃著，我在一粒水煮蛋上撒細細的鹽，又拿起一包細砂糖，為了打破鹽和糖間的沉默，我隨口問道：「你們是怎麼認識的？」

舅舅看著我說：「我們是中學同學，男生部和女生部只隔一道圍牆，她是高一從高雄轉來的轉學生。」老婦人點點頭，甜美笑著，白髮在流動的冷氣間顫動，「那時候我參加男女部共同的社團活動，你舅舅很照顧我。」又小聲問了一次：「你記得糖廠的事嗎？」舅舅也再回答了一次：「怎麼能夠忘記。」

怎麼能夠忘記呢？吹過甘蔗田的南風，也給鹽田帶來豐沛和暖的氣候，一甲子前的往事，並未如風吹逝，已經失去青春形象的女生，一早從家裡搭上糖廠的小火車到岡山，搭上清晨第一班列車前往台南。搖搖幌幌的小火車，在歲月間遺留的滿滿甜味，連空氣也是清甜的。小時候，我曾經看著小火車，這樣的幻想著，

我要和我剛交到的小女朋友坐上小火車，在穿過甘蔗田時獻上我的初吻。

有段路上，小火車穿過兩旁高聳的甘蔗，像一堵綿延的時代的牆，帶著我走吧，從日本人的殖民時代隆隆駛過，那是用糖作標誌的年代，雖然離戰爭這麼的靠近。

那年，太平洋戰爭剛結束，舅舅那一代，才送走日本達達的軍隊，幾個月後，國民政府軍即從島嶼另一端登陸，彷彿戰火的氣息越過海溝追過來。舅舅那一代的男生必須理光頭，跟著外省腔調的老師喊「殺朱拔毛，打回大陸去。」學生在課堂上慷慨激昂高唱〈松花江上〉，那是段島嶼動員的歲月，鹽和糖都是配給品。

六十年代末期，舅舅在文旦樹下告訴我，他那中學的靈魂納悶著，鹽分地帶那塊土地，不就是他的家鄉嗎？為什麼還要回到松花江呢？「我跟老師問了這個問題，老師要我罰站，說我不愛國。第二天，軍訓教官通知爸媽來，爸媽一直跟教官陪不是，我才沒有被送去關起來。」

我後來讀資料知道，白色恐怖歲月裡，原應流動陽光和鹽份的土地，許多文藝青年都冠上了反動的罪名。鹽分地帶原有寫詩的傳統，詩人天生的反叛卻在肅殺的歲月，成為羅織叛逆的原罪。舅舅回憶他們跨校成立詩社，我眼前這名老婦人也加入了他們。他們一起寫詩，躲在學校的陰暗處讀詩，讀完即燒毀，當作彼此的秘密。

有一首詩，寫到孤島和無望返家的水手，卻意外流洩。多年後舅舅猜想，應該是某個外省籍的同學舉報。軍訓教官來了，到每個班級查問，要揪出寫那首詩的人。

那天，舅舅和女同學決定逃學，他們背著書包各自溜出學校後門，就在十字路口不知往何處去，舅舅心中一陣荒涼。女同學提議，去搭糖廠的小火車吧，那是她熟悉的路線。他們在鐵軌邊等待小火車駛近，停下，車廂正要返回糖廠的途中爬上去，他們聽著小火車規律的節奏，經過幾個號誌作響的平交道，通向岡山站。那年，台糖響應政策，載著廣播、圖片和電影的反共抗俄列車從台中出發，沿路停留。他們就在岡山站遇上列車，上車參觀，跟著整個車站的旅客高喊口號，

像一把糖融進煮沸的水中。

舅舅回憶，他一點也不記得喊過什麼口號，卻是他和女同學這輩子唯一的一次約會，就在殘留蔗糖的氣味和只有熱但無情的口號間度過。

黃昏來臨，列車上的人群已散去，女同學向舅舅道別，說她要休學了，不準備再回到那所學校。

我聽著他們的追憶，順便在我的卡布奇諾裡加糖，隨口問道：「所以那首詩到底是誰寫的？」

他們彼此望了一眼，神祕笑著，老婦人問道：「你還寫詩嗎？你不是說，你擁有鹽分地帶的詩人的基因？」

舅舅露出尷尬的笑容，「別開玩笑了，現在是柴米油鹽醬醋茶。」我加了一句：「還有糖。」看著糖在我手中的杯內溶解，嘆氣。

想著，我，在學校也參加過詩社，在校刊發表過幾篇詩。那一年，我參加鹽分地帶文藝營，隨著詩人登上七股鹽山，鹽粒在我們腳下綻開，陽光總是強烈的，一如往昔，但在回途，我見到往日記憶中的鹽田鋪上太陽能發電板，和遠處的鹽山輝映耀眼閃光的白。白是我記憶的一頁，我甚至無法想像雨落在鹽分地帶的情景，同樣的一場雨，也靜靜下在南方的甘蔗田。

傳出鄭成功託夢，要向原住民道歉的那年元宵，全家人來到鹿耳門天后宮的縣道旁，這裡是歷史的起點，我們望著煙火上升，綻放，攪動夜空的螺旋，好像一個盛世的來臨和消失，一個什麼，好像空中有道聲音告訴我，道路就在前面，我們隨時準出發。

宴席將盡，我起身付帳，走回餐桌，瞥見兩個老人的手相互疊著，但只有那麼一瞬間，他們又回復原先的矜持，老婦人長嘆，聲息仍是甜蜜蜜的糖，「你要保重你的身體啊。」

舅舅點點頭，又恢復我認識的那個堅實的靈魂，「放心，我不會被打倒，因為我是鹽分地帶的男兒。」

這是一首詩，一首用生命，用鹽和糖一起寫就的詩。用我的記憶一道一道畫下，白色的烙印。

告別，也不知何時再能相見了，我收下那盒月餅，走出餐廳。